

晚清圣母圣心会在阿拉善旗的传教活动

□张 晟 [福州大学 福州 350002]

[摘要] 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阿拉善旗的传教活动获得很大进展。传教士的成功在于其传教方法得当。教会的传教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加深了地方社会的半殖民化程度。

[关键词] 圣母圣心会; 阿拉善旗; 传教

[中图分类号] B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8)02-0108-05

从 1865 年到 1952 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ICM)在中国北方进行了将近 90 年的传教活动。阿拉善旗是其重要的传教区域。对其在阿拉善旗的传教情况,国内有学者进行过研究,但很不充分。本文拟以所搜集的资料对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阿拉善旗的传教活动作较为系统的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晚清时期阿拉善旗的东北接乌兰察布盟乌拉特界,东与伊克昭盟的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及右翼中旗以黄河为界,东南隔贺兰山以宁夏府为界,南接凉州、甘肅两府,西连额济纳旗,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全部和阿拉善右旗的大部以及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与乌海市的一部分^[1]。

一、1900 年以前传教士的传教活动

1865 年在圣母圣心会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初,活动区域主要在西湾子(今河北崇礼县)、西营子(今河北尚义县)一带。1870 年左右,传教士开始向邻近的察哈尔蒙古人传教,但所获甚微。为吸引过往的蒙古香客和商人的注意,传教士于 1872 年在西营子修建了新罗马式风格的教堂。落成后的这座欧式建筑的确吸引了一些过往者的注意,其中就有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

1874 年 8 月贡桑珠尔默特在路过西营子时到教堂参观,并邀请在此传教的德玉明(Devos Alfons)神父到定远营(阿拉善旗札萨克衙门所在地,今天为阿拉

善左旗人民政府所在地)旅游。德玉明接受了贡桑珠尔默特的邀请,并与贡桑珠尔默特同行至归化城。贡桑珠尔默特在归化城的债主要贡王清偿债务,于是德玉明借给贡桑珠尔默特 500 两银子以偿还债务。德玉明试图通过此举讨好贡桑珠尔默特。德玉明神父于 1875 年、1876 年两次抵达定远营,但针对蒙古人的传教工作仍未能展开。1876 年 3 月,德玉明离开定远营到阿拉善旗东北部的三道河子一带传教。

三道河子(也称为三盛公)在今磴口县境内,为阿拉善旗的牧地。三道河子一带土壤肥沃,适合农业,从乾隆年间起,三道河子被逐渐开垦,到道光三年开辟出的土地有 1190 顷。在西北回变中,阿拉善旗遭到严重破坏,三道河子一带的耕地数量锐减到 400 顷^[2],在此耕种的汉族农民死亡、逃跑殆尽。

在定远营传教受挫的德玉明,在三道河子一带通过大量租赁土地进行传教,到 1879 年,德玉明共租赁了三道河子一带 7 个地方(奎元号、红盛义、锦恒西、自盛隆、兴盛扬、景宁泰、三盛公),总计 52 顷 32 亩的土地,并实行了“谁想种地就得入教,不入教就不能种地”的措施。不仅如此,德玉明还从别处迁来教民,奎元号和红盛义安置了 30 多名来自内地的灾民和 20 多名从鄂尔多斯迁来的蒙古教民;在锦恒西安置了 107 名从准格尔旗阿济尔玛(汉语名为尔驾马梁)迁来的教民,德玉明还从岱海川带领 150 多名教民到三道河子居住。迁来的教民如遇困难,传教士给予救济,提供耕畜、籽种。德玉明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果。1876 和 1877 年山西、陕西等省因遭遇旱灾

• [收稿日期] 2007-08-29

•• [作者简介] 张晟(1972—)男,博士,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师。

而到三道河子的汉民,为生活所迫,纷纷加入了教会。当时流传下来的顺口溜形象地反映了人们入教的情况:“天主圣母玛利亚,热身子跪在冷地下,神父!哪里种地呀?噢来!红盛义去种吧!”;“你为什么进教?我为铜钱两吊。为什么念经?为了黄米三升”^[2]。德玉明把获得的那七块土地建设为教民村。在他的带领下,入教者过着严谨的宗教生活。无论男女老幼,每天五更时起来同堂念经,天亮后成年男子种地,男童读书,妇女和女孩做针线活。入教者每人每月可以领到粮食“一斗五升、菜油一斤。小孩子六岁以下每日二勺半。三岁以下无粮。”为解决入教者的口粮,德玉明神父还带领教徒到平罗县去买粮食^[3]。

由于教务发展迅速,1883年成立了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府设在三盛公,德玉明任首任主教。1884年德玉明又在天兴泉租赁了19顷土地,此后德玉明还返回比利时募集兴办育婴堂的钱款。1888年德玉明开始修建三盛公大教堂,但在次年德玉明患病去世。随后韩默理(Hamer Ferdinand)调任主教。1893年三盛公大教堂建成。1895年传教士又在教堂周围修建了围堡,在南粮台、天兴泉也修建了教堂^[2]。1900年春,韩默理把主教府迁至二十四顷地。

二、1900年阿拉善旗的反洋教运动

1900年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反洋教运动如火如荼,二十四顷地教堂被清军攻破,韩默理被杀,一时阿拉善旗的局势相对平静。当时躲避在三道河子教堂的传教士共有15人,即来自三道河子一带传教的戴天禄(lateyr Achiel)等5人;来自宁夏府下营子的2人,从二十四顷地逃出的6人;来自乌兰卜尔的2人。另外,在教堂的教民也为数不少。当时传教士与教民准备固守教堂,但包围教堂的阿拉善旗总管安九(蒙语名为阿木尔吉日嘎拉)并不急于进攻教堂,而是晓谕教民背教,并承诺保证教民的人身安全。结果许多教民纷纷从教堂离去,这使得传教士无法固守,被迫离开教堂,取道外蒙古回国。这15名传教士是如何离开教堂的,不同资料的叙述有很大不同。教会人士李林编纂的《拳匪祸教记》称:“六月二十九日安九至三道河子近处谓教中绅士曰:‘余与天主堂交素善,必不害汝曹。但拳民甚众,力亦大。余不能遏阻。尔曹自为计可也’。其言不足恃。故教士与修院生十六人,亟造铅丸铜帽土砖,以备守护。远近教友或入沙漠,或往遐方,凄惨万状。七月二十四日,三道河子十五教士为安九所逼,束装出境,随者十四人,马二十

九,骆驼二十五,犬二”^[4]。

这段资料比较隐讳的反映了在安九的诱迫下,许多教民背教的史实。对传教士如何为安九所逼,又如何得以离开教堂,《拳匪祸教记》并未交代,而《闵玉清传》的相关叙述是:“(安九)不考虑拳匪叛乱的后果,想把传教士驱逐到戈壁沙漠中去。他们的用意是把这些人提到远远的荒野地带杀害他们,并且在狼山预先设备好了埋伏陷阱。但天主不允许这样的大屠杀,而他是要有久经锻炼的传教士在变乱后重振教会。蒙古的妄想没有成功,把他们驱逐到遥远的地方,一直到了大库伦没人烟的荒凉地带”^[5]。

这段资料的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在教民纷纷离开教堂后,传教士实际上陷入了绝境。此时安九若想杀死传教士并非难事。假使安九真的想杀死传教士,他怎么可能会让传教士携带牲畜、食物离开教堂呢?他也没必要不在阿拉善旗境内的狼山设伏。在当时举国若狂,以杀洋教士为能的情况下,安九根本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安九在光绪二十七年给阿拉善亲王多罗特色楞的禀呈中称:“去岁本旗三盛公洋人等教长戴天禄派奉教民贾大前来言说:‘现在中外开衅,拳匪恐将骚扰此地。趁匪徒未来之时,我等归回本国,恳求体恤我等,并抚养所遗教民,将大经堂一座设法照旧存留,离此二三十里之几处小经堂,不但不能兼顾,且恐义和拳匪乘间前来栖身,杀害万民,因此垦将小堂概行拆毁,一总保护而杜祸萌……’等语。本员当即照其所请将小堂拆去,所有木植妥为收存,至今尚在。旋又专人前来言说:‘现在我等临行收拾路用之际,奉教民人乘间窃取在外牲畜、在内物件,以至路用不济,恳祈助给路费……’等语。因照所恳,一面飭派兵丁二十名,代为看守教堂院门,一面设法助给路只账房银两等项,核算共计一千余两之谱,帮伊护送起程”^[6]。

应该说,这段叙述与史实相去不会太远。当时清政府的政策是在教民武装负隅顽抗的情况下,地方官员才能痛加剿杀。若教民武装自行解散,地方官员除保护教民的安全外,还应派人护送传教士安全出境(当然一些极端仇教的官员并不严格遵守这一政策,在反洋教运动高潮时期尤其如此)。在三道河子教堂内的教民离开教堂后,处于绝境的传教士选择回国自然是明智之举,他们请求包围教堂的安九准许他们离开也顺理成章。此外,他们被困在教堂内,难以准备途中所需的物资,请求安九提供也很自然。安九对其请求是一一照办,并派蒙兵护送传教士出境。应该说,安九的谨慎举措是适当的,避免了如新教牧师及

家属9人在大余太被杀一类惨祸的发生。但传教士并不感恩,其在赔教期间要求将安九革职,还向阿拉善旗提出巨额赔偿要求。教会资料有意掩饰传教士向安九哀求准许离开及安九提供物资并派兵护送的史实,既是为教会保留颜面,也是要遮掩传教士有负安九等蒙官恩义的行径。

至于传教士离去后安九如何对待教民的问题,教会著述与清朝档案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据《教务档案》阿拉善旗的相关禀呈内容是:“在派兵护送传教士离去后,安九晓谕教民‘勿庸惊惶’,并派兵维护治安,看守教堂。对从二十四顷地、乌兰卜尔等地逃来的教民也同样予以保护,还提供衣食。为抵偿资助传教士离去的花销,以及救助遭受旱灾的蒙古牧民,安九向教民摊派了粮食^[6]。对此,圣母圣心会的相关档案内容却是:“安九欺骗、迫害教民,强行拆毁教堂,喇嘛们亵渎圣堂、损毁祭器,蒙兵则将神父住屋洗劫一空。大多数教民张贴红纸宣布脱离教会”^[7]。应该说,这两方面的资料都有其片面之处,阿拉善旗的禀呈对己方保护教民的行为多有夸大,对强迫教民出教、将教堂改作佛寺则有意掩饰。教会资料则正好相反,其夸大了安九对教民的“迫害”,有意回避了安九庇护本旗及从别处逃来避难教民的史实。

三、赔教与教会的发展

1900年秋,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反洋教运动逐渐平息。1901年闵玉清(Bermyn Alfons)神父继任了西南蒙古教区的主教,回国的传教士也返回到阿拉善旗。

在反洋教运动时期,阿拉善旗境内的传教士被护送出境,又无一教民死亡,阿拉善旗当局拒绝了传教士提出的退还土地和赔偿损失及救济教民的请求。闵玉清遂到北京活动,向法国使节和比利时使节禀报称:“三道河子一带教民危困”、“(阿拉善等旗)散布传单,速集兵马粮械,先将汉民逐出,再将教民另聚一所,正月内必有扰攘”。陕西当局也收到闵玉清类似的禀呈^[6]。在法方的压力下,清政府指示地方官员进行调查,结果却均是“教、民始终相安无事”。阿拉善亲王多罗特色楞还呈递了教民给他的感恩禀呈^[6]。光绪二十七年的春夏之交,陕甘总督崧蕃又多次接到闵玉清禀呈:“三盛公现在教民二千有余,俱皆无粮,束手待毙。又有总管蒙古安九暗中聚兵,张扬复仇”;“现有夷地安九今不守分,端为首恶,结联匪徒王祥林,纠集乌拉地、打拉的二处兵马数百人,驻扎乌兰

包地方,大肆猖獗滋扰伤害”^[6]。对此宁夏道官员派人前往查探的结果却是“并无纠兵复仇情事”。多罗特色楞对闵玉清的禀呈予以了驳斥:“诂料本年该教民等忽捏诬砌词,另控与外来之教士闵玉清,藉端讹诈。窥其情意,该教民与教民两不相合,有反教远遁者,亦有反教今仍复从者,又见和局将成,恐教士转回追问,藉此一口两舌,搬弄是非,移祸于人,事或有之”^[6]。

关于“匪徒”王祥林,多罗特色楞也进行了介绍:“再,王祥林子原系奉天主教,今自改奉大教,设供关帝牌位,因此该教士闵玉清恐其纷纷效尤,深恨之,故为造言,其实与王祥林子别无他故”^[6]。

另外,多罗特色楞又再次张贴保护传教士、教民告示,要求安九照旧保护教民,还从宁夏道借取了100石粮食发放给教民。宁夏道还借给闵玉清1000两白银赈济教民,并劝说闵玉清“毋与蒙人为难”。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六,闵玉清到归化城向归绥道恩铭称:“三道河子、乌兰卜尔有匪徒勾结蒙古聚众仇教,约期起事,情形甚为危险”,表示要到北京去请洋兵。恩铭急从包头调派清军前去弹压。十四日,清军抵达乌兰卜尔,并很快查清事实:蒙民与汉民因争夺水渠发生群殴。待清军到时,事态业已平息。清军头领管带聂心田又对当地居民和传教士进行了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在三道河子的传教士曾送信给当时在乌兰卜尔的闵玉清,称有蒙古(应为安九)调集蒙兵,意图仇教,要闵玉清快逃。十八日,清军抵达三道河子,在此传教的白文治(Bekaert Juul)神父称:“安九已于十七日被多罗特色楞调回,蒙兵也已散去”^[6]。安九果真调兵仇教了吗?多罗特色楞的说法是:“(安九)因教民将好为仇,多方诬赖,不得已前往归化城一带寻觅三盛公教长戴天禄前来质证解纷”^[6]。

应该说多罗特色楞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闵玉清的四处控告使安九承受了巨大压力,为此他带兵寻觅1900年在三道河子传教的戴天禄神父以洗刷自己,其采取这样的行动不能不说是莽撞。由于多罗特色楞将他及时调回以及清军的到来,从而避免了安九与传教士间的激烈冲突。对于闵玉清的种种举动,陕甘总督崧蕃作出了这样的评论:“查闵玉清始而借银,继而借粮,均经照准发给。是三道河子一带本无事故,数月以来,文电频繁,皆由该教士闵玉清意欲乘机索赔,而又不能直说,遂不得不节外生枝,希图恐吓蒙人,饱其私囊。蒙人理直气壮,断不甘受讹索,此三道河子平空纠缠无查办之实情也”^[6]。

在法使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将安九革职,要求

阿拉善旗就赔教事宜与传教士谈判。光绪二十八年秋,在清政府的多次催促下,阿拉善旗派安九到宁夏城与传教士白文治、李鸿猷(Van Peer Frans)进行谈判。传教士起初要求赔偿20多万两,随后又降低到18万两。对此安九颇感不平:“本旗因是非不论,一味贪求,殊与中外国家以义制事、以仁交邻之道有乖,实非和平办法”;“惟查小桥畔、下营子各案,实有杀毙抢毁各情事,赔偿亦只数万。以之相较,本旗纵不论功,亦何至大为受过”^[8]。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首次谈判无果而终。光绪二十九年正月,蒙教双方进行第二次谈判,在宁夏将军色普徵额的协调下,勉强以赔偿8万达成协议,但在具体支付上,蒙教双方仍有分歧。传教士提出,本年须先支付1万,三道河子暨教民申朝聘耕种地亩作价3万,钱到回赎,照旧纳租。其余4万分4年交清。阿旗蒙官提出以吉兰泰盐池作抵押,由陕甘总督代筹钱款。崧蕃以吉兰泰盐池难以官办为由,要求阿旗自行招商后才能借给钱款。至光绪三十一年,阿拉善亲王多罗特色楞以亲王俸禄作押,陕甘总督升允方才借给阿旗1万两偿还赔款。阿旗又自筹1万两,仍欠6万两,经外务部与法使协商,闵玉清终于同意让步。同年七月蒙教最终以赔偿5万两达成一致,剩余3万两阿拉善旗以三盛公附近及毛诺海11处土地质押给教会,钱到回赎^[6]。在阿拉善旗赔教过程中,闵玉清的表现让人瞩目。在反洋教运动时期,由于阿旗蒙官安九的处置妥当,直接索赔很难成功,闵玉清不惜制造谣言,以引起外界,尤其是法使、比使的注意,促使、甚至是唆使他们频频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最终迫使阿旗向教会进行了赔偿。尽管闵玉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也赢得了“土著骗子手”的绰号,并为后人所熟知^[5]。

反洋教运动后,闵玉清将三道河一带被拆除的教堂一一修复,又新修了渡口教堂和补隆淖教堂,并迁移了一部分教民前去垦种,使渡口和补隆淖发展成为两个较大的教民村(详见下表)。

1885~1911年间教务发展表^[7]

教民数 年份	三盛公	天兴泉	南粮台	渡口	补隆淖	总计
1885	400	120				520
1886	450	145				595
1887	478	163				641
1896	613	184				797
1903	651	319	412	440	482	2404
1904	1035	363		568	232	2198

(续表)

教民数 年份	三盛公	天兴泉	南粮台	渡口	补隆淖	总计
1906	587	228		561	301	1677
1909	553	335	593	705	602	2788
1911	503	285	515	824	610	2837

为培养忠实信徒,传教士还在三道河子兴办学校,以加强宗教灌输。1880年三盛公小学成立,分男女两校,主要招收教民及附近居民子女,教学内容以要理问答为主,另学一些文化知识。此后传教士又在南粮台、天兴泉、渡口、补隆淖等天主教村设立小学,主要进行宗教教育。为培养神职人员,传教士还在三盛公设立了修道院,传教士还在教堂收养了一些被遗弃的女婴,将其抚养成人,以信教便可婚配女婴为手段发展教民^[9]。为发展三道河子一带的农业,1902年至1908年间,传教士先后主持挖掘了三盛公渠、广庆元渠、渡口渠等水利设施^[10]。

在传教士的努力下,到民国时期,教会控制的区域已建设得有声有色,对此,一些地方志的编纂者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于是教堂遂拥有该处土地,招募人民开渠道、垦荒地、筑城寨、植树木、设学校、立医院,迄今阡陌纵横,绿荫蔽野,且因禁种罂粟,田原不见毒卉,成为沙漠中之乐园。三盛公堡内,居民百余户,教堂规模颇大,教士男女各八九人,均为比籍,有自设之中、小学校教育教民,并设有各季夜校,利用余暇,课人读书。现宁夏及绥西一带,所有识字的人民,除少数外来移民外,泰半是教徒及其子弟。……所设医院,嘉惠平民亦多,例如将此区域之婴儿死亡率自百分之七十降至百分之三十。即此一端,可见一斑。教堂周围,果园花圃,随处可见,景物宜人,俨然世外桃源”^[11]。

四、余论

晚清时期,传教士在阿拉善旗三道河子一带传教活动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和传教士不畏艰险,深入民间了解民众疾苦,制定出适应民众需要的传教方法有关,也和三道河子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关。三道河子远离阿拉善旗统治中心,蒙旗当局鞭长莫及,传教士针对汉民的传教对蒙旗的统治也构不成大的威胁。当然,法国的支持也是传教士在阿拉善旗传教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传教士在阿拉善旗三道河子一带的传教活动客观上为稳定社会秩序,进行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文

化水准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传教士的活动也部分的侵犯了地方当局的主权,加深了所在地区的半殖民化程度。

参考文献

- [1]周清澍.内蒙古历史地理[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207-208.
- [2]宿心慰.天主教传入磴口地区述略[Z].磴口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
- [3]吕实强.教务教案档(第3辑)[Z].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899.
- [4]李秋.拳匪祸教记(增补本)[M].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2:324.

[5]彭嵩寿.闵玉清传[M].胡儒汉、王学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天主教爱国会,1964.

[6]吕实强.教务教案档(第7辑)[Z].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1981.

[7]TAVEIRNE P. Han - 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 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Hetao)1874 - 1911[M]. Brussels: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4.

[8]朱金甫.清末教案(第3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8.

[9]易人.磴口县天主教办学史略[Z].磴口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

[10]朱永丰.磴口县天主教堂的农林水牧[Z].磴口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

[11]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

The Spread of the CICM Mission in Alashanqi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Yu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The Congregation Immaculate Cordis Mariae(CICM) Mission got rapi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hurch's success is attributed to the appropriate missionary work method. The church's missionary work had the positive influence, simultaneously also deepened colonial degree of local society.

Key Words the CICM Mission; Alashanqi; missionary work

(编辑 戴鲜宁)

(上接第75页)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Starting Point to Promote a New Liberation of the Mind

MA Dong - cai

(Dezhou Party's School of Shangdong Province Dezhou 253015 China)

Abstract A new liberation of the mind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route, the precious method to solve various new problems and pioneer new career, as well as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propel the care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new liberation of the mind should be promoted in a new starting point.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ssential requirement; new starting point; liberation of the mind

(编辑 刘波)

作者: [张彧, ZHANG Yu](#)
作者单位: [福州大学, 福州, 350002](#)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8, 10 (2)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11条)

1. [周清澍](#) [内蒙古历史地理](#) 1993
2. [宿心慰](#) [天主教传入磴口地区述略](#) 1989
3. [吕实强](#) [教务教案档](#) 1899
4. [李杖](#) [拳匪祸教记](#) 1932
5. [彭嵩寿](#); [胡儒汉](#); [王学明](#) [闵玉清传](#) 1964
6. [吕实强](#) [教务教案档](#) 1981
7. [TAVEIRNE P](#) [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 A history of Seheut in Ordos\(Hetao\)1874-1911](#) 2004
8. [朱金甫](#) [清末教案](#) 1998
9. [易人](#) [磴口县天主教办学史略](#) 1989
10. [朱永丰](#) [磴口县天主教堂的农林水牧](#) 1989
11. [丁世良](#); [赵放](#)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 1989

引证文献(1条)

1. [梅荣](#) [庚子年内蒙古阿拉善旗王公礼送外籍神父出境事件述略](#)[期刊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5)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802025.aspx